

美国长篇小说全译本



〔美〕威廉·斯泰隆著

# 索菲的选择

美国长篇小说全译本

# 索菲的选择

〔美〕威廉·斯泰隆著

潭  
雄  
明  
译

[湘]新登字002号

William Styron  
Sophie's Choice

根据美国Bantam Books公司  
Bantam版(1983年印刷)翻译

索 菲 的 选 择

[美国] 威廉·斯泰隆著

谭 雄 明 译

责任编辑：余开伟 周小立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1989年8月第1版 1994年12月第3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9.25

字数：4271 印数：12,401—32,400

ISBN7-5404-0407-8

I · 328 定 价：11.80元

谁将以本来面目展示婴儿？谁将把它放在它自己的星宿之中，手中握着测量的尺子？谁将用变硬的面包来制造婴儿的死亡——或者把面包留在那里，让它噙在圆鼓鼓的口中，像哽噎的甘甜苹果之核？……谋杀者的心不难猜测。可是这个死亡，不折不扣的死亡——甚至在生命开始之前便轻轻地抱着它，好好地爱护它，这真是不可言状，无法形容！

### 得维诺挽歌之四

——拉伊内·马历亚·里尔凯①

……我寻求心灵的最深处，那里绝对的邪恶与兄弟般的友情面对面相遇。

——安德烈·马尔卢②

1974

---

①十九世纪德国诗人（1873—1927）

②法国作家，戴高乐政府的文化部长（1901—1978）

# 性爱和生存困惑的深刻观照

## ——编者前言

美国作家威廉·斯泰隆所著长篇小说《索菲的选择》，是八十年代初美国和西欧各国最畅销的文学名著。它一问世即引起了世界性的轰动，世界各国权威报纸纷纷发表评论文章，给予了极高评价，并被译成各种文字，发行量超过三百万册。这部作品曾荣获普利策文学奖，根据原著改编的同名电影由著名国际影星斯特里普主演，曾荣获奥斯卡金像奖。上述事实奠定了《索菲的选择》世界名著的光辉地位，这是肯定无疑的。

索菲是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一位美丽、性感的波兰女郎，而男主人公分别是犹太学者纳山和美国青年作家斯汀勾。作品淋漓尽致地描写了他们三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命运经历和如醉如痴的情爱纠葛，使人感叹备至，深思不已；特别是索菲和纳山最后双双殉情，选择死亡的情节，更是凄艳欲绝，惊心动魄。索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受尽德国法西斯摧残、蹂躏，则惨绝人寰，令人发指。

小说故事情节是这样展开的：青年作家斯汀勾来到布鲁克林犹太区，在一家公寓中遇上了索菲和纳山。斯汀勾最早和他们相识，是由于索菲和纳山同床共枕做爱时床铺的震响，连同欢快的叫喊声，透过薄薄矮矮的楼板，传到了底下斯汀勾的房中，使他饱受煎熬。然而这疯狂的作乐，不一会就被愤怒的争吵和

摔打所代替，这使他茫然不解，倍生悬念。可是头顶上那张床使斯汀勾卷进了那对恋人的关系网络中，并且愈陷愈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索菲和他的两个孩子都被抓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德国法西斯只准许她在一双儿女中留下一个孩子，另一个孩子将被送往毒气室处死。她被迫舍去的女儿在被强行拉走时，眼里向母亲流露出凄惨的求生和求救的目光，深深刺进了索菲的心灵，给她刻下了永世的无法医治的创伤。当她被迫把自己的肉体出卖给纳粹头目赫斯，试图挽救仅存的儿子的生命时，一个同性恋狂、集中营的女看守袭击了她，放肆蹂躏了她的肉体，使索菲痛不欲生。

战争结束后，索菲死里逃生，认识了犹太人纳山，她俩相爱了，狂热的爱情使索菲得了新生，变得愈加美丽而多情。但是，纳山是个吸毒的精神分裂病患者，在正常情况下，纳山对待索菲极其恩爱体贴，对待斯汀勾也非常热情友好。但他吸毒后就变成一个道地的恶魔非常残忍地对待索菲，对斯汀勾充满敌意，威胁说要枪杀他俩。索菲和斯汀勾面临生命危险，慌忙逃命，离开了布鲁克林，走向南方斯汀勾老家躲避。在那里，索菲与斯汀勾情意缠绵，坠入爱河，斯汀勾幻想与索菲永结连蒂，共享人生。俩人住进了华盛顿一家旅馆。半夜，斯汀勾朝思暮想的一刻实现了，索菲十分主动、温柔、体贴、大胆，时而紧紧催促，时而软语温存。斯汀勾心灵却一片空白，眼前一片漆黑，他坠入了万丈深渊。然而第二天清晨醒来时，索菲已悄然离去。嫉妒和愤怒延误了斯汀勾拯救索菲的时机。等他赶回布鲁克林，公寓周围已围满了人。在索菲的房中，他看到的是索菲和纳山的尸体，房中放着打开的电唱机，他俩安详地躺在那张做爱的床上，紧紧拥抱在一起，脸上没有丝毫痛苦的表情，就好像双双

入睡。索菲和病态的情人纳山，最后选择了最终的归宿——死亡。

《索菲的选择》是继《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之后，所出现的当代描写人性爱和生存困惑最深刻动人，最淋漓尽致的杰作，它所涉及的社会内容以及涵盖的思想容量则比《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深厚得多，丰富得多，同时更富于鲜明的时代特征和艺术特色，具有很强可读性和吸引力。堪称雅俗共赏的艺术佳品。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个版本，是至今全国唯一的全译本，未作任何删节，这就更有具代表性。

《索菲的选择》涉及了性爱、种族和死亡这三个人类面临的生存困惑的重大问题，这构成了作品错综复杂而又悲凉凄清的三重奏、它留给了读者一连串深思，而给予读者心灵的浸润和精神的震颤是无比强烈的。

从作品中我们可清醒地看到，在美国这个所谓自由、文明、享乐的国度，索菲并没有摆脱过去恶梦中邪恶的追逐。她为了谋生只得在一家按摩所工作，却饱受歧视，遭到指奸……诚如作品中一个意象所暗示的，她又踏上了与撒旦幽会的马车；窗外闪过的一幕幕图景是美国社会的侧面，但同样也渗透着种族偏见的毒汁，隐藏着文化差异的宿怨。这一既甜蜜又痛苦，既亲近又疏远的图景里，不但有恋人世界的隐秘，还有大千世界的喧嚣；不但有令人动容的激情奔湧，也有表面无动于衷的漠然沉寂；不但有两个热恋的身影，还可以听到第三者，或第四者…的声音，其中有欢乐，有痛苦，深深的痛苦，青春，死亡，生命，毁灭，人类的极致在作品中都有着摧肝激胆的悲怆体现。

斯汀勾愈来愈深地卷入了索菲和纳山悲剧性的爱情漩涡。这是一个复杂、危险但都有着巨大吸引力的漩涡。他与索菲会

见于公园。她把他带入了她一个又一个的秘密之中，他一步一步地走入了索菲与纳山内心的深处。对奥斯维辛恐怖的回忆和纳山枪杀的威胁，使他俩进入了惊人的亲密，但数次亲密之后伴随而来却是自杀的阴影。经过与斯汀勾南下途中在旅馆一夜疯狂的做爱后，索菲象一只飞蛾扑向火焰，离开斯汀勾奔向毁灭，她最后选择了死亡，或毋宁说她选择了爱，重又投入了情人纳山这位不幸的精神分裂病人的怀抱。她是在斯汀勾的眼前走向死亡的，她的死以及纳山的死，是一种强烈的控诉，是对病态的社会、对惨淡的人生、对人类的邪恶彻底的决裂和唾弃！

纳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但他决非疯人！这个富于感情和正义感的可怜人，他实际上是时代和社会的受难者和牺牲品。他是整个犹太民族苦难和不幸的象征。

然而，索菲这个女性也是社会和男性、甚至还包括同性恋的女性铁爪下的羔羊。她受到父亲的压迫、纳粹的迫害、纳山的虐待，甚至还成了斯汀勾长期寻求泄欲的第一个猎物。

作品中有许多令人深思的矛盾纠葛。从反犹太人家庭和灭绝犹太人的集中营逃出的索菲，偏偏又投入犹太人纳山的怀抱；纳山既仇恨波兰迫害犹太人，又深爱这位波兰故娘，这都蒙上了一层冥渺的宿命色彩，构成了人类生存困惑的谜语。

《索菲的选择》的作者威廉·斯泰隆，是美国当代的一个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他这部长篇小说涉及到了本世纪许多重大事件和问题，甚至有许多是真人真事，而且用第一人称道出、写得真实可信，情真意切，使人不由得为之牵肠，为之魄动。它宛如一部鸿篇日记，不事矫情，不作虚伪，即使牵涉到许多性爱经历、也不回避。但作品中的有许多性爱描写不是庸俗低级地为展示性而写性，而是为了主题需要，情节需要，情之所至，

栩栩画出，充满着激情和审美价值。

事实上故事中的性爱描写乃是作品中最精妙妙笔之一，它可以说成为了当今（乃至于包括过去）文学中的典范。作品中的主题通过爱（或恨？）表现，其主要体现是性爱，因而性，这一人类共有的生命和生理本能（甚至是社会机能）成为了本书一根响亮的琴弦，它不仅弹奏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主题，而且本身还是美国社会（甚至是整个人类社会）当代性爱生活独特的反映、是对性爱这个超越时空、超越国度、超越种族的问题的形象注脚。

余开伟一九九三年八月

# 第一章

那个时期，便宜的公寓在曼哈顿几乎无处寻找，因此我不得不搬到布鲁克林区。那是1947年。那年夏天许多令人愉快的印象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它的天气。那时天气晴朗温暖，到处飘着花香，好象时光永远是春天。我为此不免心生感激之情，因为此时我正处于生活道路上的低潮。当时我二十二岁，竭力想成为一名作家。但我发现，十八岁时，那把几乎将我吞没的创作之火，此时已残灯将尽，变成一小点微弱的光，象征性地在心中，暗暗地发光。并不是说我不再想写作，我仍然强烈地希望把心中苦想了很久的小说变成现实，而是由于我写了两三段精采的开头后，再也不能写下去。或者用哥楚德·斯坦恩在谈到失去的一代时，评论平庸作家的话来说，就是：我有水，却倒不出。屋漏偏遭连夜雨，此时我失去了工作，手头拮据，而且把自己流放到了布鲁克林的弗拉克布西，于是，又一位瘦弱、孤独的年轻南方人，开始在犹太王国里流浪。

就叫我斯汀勾吧。那时候别人只知道我这个浑名，如果我还有什么名字的话。这个绰号源于我的孩提时期。那时，我在家乡弗吉尼亚。我母亲死后，父亲对付不了我，气急败坏的父亲大人就把我（当时已十四岁）送到学校。学校倒是个好地方。在我狂放不羁的性格中，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注意

个人卫生，所以别人叫我“湿阴沟”，不久这个名字就传开了。但是星移斗转，时间老人的扫帚以及我本身生活习惯的彻底改变（由于羞耻我变得几乎过分地讲卫生），逐渐把那名字中刺耳的字眼抹去，变成一个更加吸引人，或者说不那么不吸引人，但肯定更加调皮一些的名字：斯汀勾。在我三十岁的时候，这个名字不知不觉地与我分道扬镳了，我对这个损失并没有感到伤心。但是故事中的我，那时还叫斯汀勾。不过呢，如果你在故事的开始部分因为找不到我的名字而感到困惑的话，请你记住我这时处于一种病态的，孤独的状况中，就象山中石洞里头脑发昏的隐士一样，几乎是没有什么名字可叫的。

我很高兴被炒了鱿鱼。除了军中服役，这是我一生中第一个，也是仅有的一一个拿薪水的职位。我毫不后悔，虽然失去这份工作使我本来不宽裕的经济状况更加艰难起来。况且，我还以为在人生中如此早就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不适合作一名办公职员，这点，无疑对我今后具有“建设性”的意义。事实上，想想我是那么馋涎欲滴地巴望那份工作，我不禁对仅仅干了五个月就被解雇时自己那种轻松、甚至兴高采烈的神情感到惊讶不已。在一九四七年，工作很难找，特别是出版业，但幸运的好风，把我吹到了世界上最大的出版商之一那里，被委以“初级编辑”——书稿校阅员的委婉称呼。那时的美元比现在的美元值钱得多，雇主处于支配地位这一点从我这份微薄的每周四十元就可以看出。扣除所得税，每逢周五，由那位发工资的驼背矮小妇人放在我桌上的这些绿色钞票代表了我一星期每小时不过九十美分的劳动。

这苦力钱竟然是由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出版商发给的。但我

一点也没有为此感到伤心。我年轻，能屈能伸。至少在初期，我带着一种高尚的目的对待我的工作。况且，作为补偿，这工作带有堂皇显赫的色彩：在高级的“21”饭店吃午饭，与琼·欧哈拉共进晚餐；还有那些矫揉造作，不可一世，却又俗不可耐的女作家们，也在我这编辑明眼的照射下，纷纷金销玉焚，潜声匿迹……

但是不久我就发现，这些东西没有一样是真的。首先一点，虽然作为副业这个出版社也出版小说等文学书籍，但它主要是靠出版教科书、工业指南和十多种技术刊物发起家来的，这些刊物涉及广泛，从养猪法，殡葬学，到塑料纤维，五花八门，不一而足；然而它所拥有的作家花名册中，几乎没有一个能真正吸引用心于文学的人的注意。比如，在我刚到那的时候，被该社推崇的有两名最突出的作家，一位是退休的二次大战期间海军五星上将，另一位是极其臭名昭著的前共产党探子，他请人代笔的《我的错误》在畅销书单上马马虎虎过得去。虽然我还有更光辉的文学偶像，但欧哈拉对我来说，足以代表年轻的编辑乐意与之一起外出，同桌醉酒的一类作家。但是对于这个出版社，象琼·欧哈拉这样的作家却都好似凤毛麟角，不见其踪影。更糟的是，分配给我干的事真使我头痛不已。那时候麦克哥罗——希尔公司（我们雇主就叫这个名称）在文学界中，还不曾有过辉煌的成功，因为它一直以数额巨大的农业技术资料为食；因而我卖苦力的普及版编辑室妄图与著名文艺出版商斯克利伯内和克诺夫一争高低，这在同行中传为笑柄。就好象巨大的工业集团，如蒙特哥默里·沃尔德或马斯特斯，竟也厚脸皮设立一个亲切的沙龙，贩卖起貂皮和栗鼠皮来，而同行都知道这些不过是从日本买进的染了色的海狸皮而已。

于是，作为一名最低级的职员，我不仅没有机会读到哪怕是过得去的文学作品，而且还要每日在最低劣的小说及非小说中，象牛在泥沼中一样地犁过。这些一垛一垛的稿纸沾满了咖啡和肮脏的手指印，它们这种破旧的样子向世人同时宣布了作者的绝望和麦克哥罗——希尔公司在投稿者心目中不过是最后的选择这么一种地位。然而，我那时年轻气盛，并且学的是英国文学，使得我特别苛刻，要求每一字句都要体现最严肃的主题和最高的真理。对待这些孤立无援、脆弱的创作者的弃儿，我以一位法官的威严和漫不经心的厌恶处理之，就象猩猩从它的皮毛上掐掉虱蚤一样。我的确铁石心肠，刻薄，眼里揉不进半粒砂子。我们公司大楼在西四十二号大街，我的办公室在第二十层楼，而我就在这座建筑雄伟却压抑精神的绿色大厦里那间玻璃密封的鸽笼中辛苦。我不久前刚刚读完《七种意义不明确的类型》，这时就把所有的鄙视，统统地对准了高高地堆在我桌上的这些可怜的手稿：它们满载着希望，充满了蹩脚的话语。按规定，我每阅完一本书就必须写一份相当详细的报告，不论书怎样低劣。起初，这个差使还挺有意思，把刻毒和报复倾泻在这些手稿上，我觉得非常受用。但过了一段时间后，我逐渐厌倦这千篇一律的工作，甚至对窗外烟雾笼罩下的曼哈顿景色，也感到烦闷起来。而写冷漠的阅读报告，则早已索然无味。这类报告，作为那个枯燥乏味时期的遗留物，我小心地保存了一些，现谨原封不动地摘录几篇。

《高高的大叶藻》，作者埃得蒙尼亞·克罗  
斯·斯蒂克。小说。  
南纽泽西沙丘和酸果蔓沼泽中的爱情和死亡。

主人公维拉得·斯特拉沙威，年轻的普林斯顿毕业生和一家大酸果蔓包装业主的继承人，疯狂地爱上了罗玛娜·布莱恩这位左翼分子和罢工领导人的女儿。情节复杂尖锐，主要围绕布兰东·斯特拉沙威，即维拉得的父亲这位工商巨头阴谋除掉罢工的领导人，也就是罗玛娜的父亲，此人的尸体后来在酸蔓果收割机中找到。这导致了一系列的相互控告，最后几乎使男女主人公同归于尽。维拉得被描写成具有“普林斯顿特点，象猫一样优雅”的年轻男子，而罗玛娜则被描写为“苗条敏捷的身体，几乎掩藏不住里面涌动的泛滥春潮。”

甚至在我写报告的时候，还在倒胃口。我只能说，这也许是一位女性，或一头畜牲，所写出的最坏的小说。建议用最快的速度回绝。

啊，聪明自负的年轻人！把一头头无助的羔羊的内脏掏去时，我是多么的贪婪，多么地高兴。我一面笑着，一面挥舞着屠刀。对麦克哥罗——希尔，我也不怕在它的肋骨上捅它一下，拿它出版低级“趣味”书的嗜好开玩笑。这些书的片断常常可以在《读者文摘》这样的杂志上刊登（这个玩笑也许造成了我的垮台）。

《管道工的女人》，作者奥得莱·维恩莱特·斯米莉。非小说类。

这本书唯一可取之处是它的书名，醒目而且低级得可以扔到麦克哥罗——希尔公司走廊的底下。作者是一位真实的妇女，与一位管道工结为夫妇

(如书名所暗示的)，住在马塞诸塞明的沃尔斯特市郊。十分枯燥无味，但却每页都强作诙谐。这些胡话希图把糟糕的生活加以浪漫化，把她滑稽的家庭生活的波折与脑外科大夫的相比拟。她丈夫就象一位脑外科医生，不论日夜，人们召之即来；就跟大夫一样，管道工的工作同样十分复杂，同样暴露于病毒之中；并且两者回家时，身上都发出刺鼻的气味。每章的标题恰如其分地体现了该书的趣味。这些标题用“污秽”来形容勉强能够达意：“搓刮叭嗒叭嗒，金发女郎在马桶中。”“排干神经。”（排污，领会了吗？）“冲刷时世。”“静蹲默想。”等等，等等。这份手稿交来时已是衣衫褴褛，不胜憔悴；它已（据作者的来信说）游历过哈帕、诺夫、兰登书屋近二十个出版社。在作者写来的那封信中说对这手稿她将不顾一切，因为她整个一生现在都维系于此——而且（我不是开玩笑）还隐约附加了自杀的威胁。我不愿意为任何人的死负责，但是这手稿无论如何都绝对不能出版。退回！（为什么我得读这些混帐的东西？）

我这些报告的读者是我的顶头上司，高级编辑弗莱尔先生，一位睡眼惺忪，聪明，失意但情绪基本上还算好的爱尔兰人。他跟我一样，也对麦克哥罗——希尔和这个巨大王国令人窒息的气氛感到失望。要不是有这一点，那份报告中的最后一句话我是不敢写的。他原来在麦克哥罗——希尔出版的各种期刊那边吃饭，如《弗母橡胶月刊》、《修补料世界》、《杀虫讯息》，以及《美国矿业》，直到五十五岁左

右，才象头老牛，游荡到我们这个稍为温暖一些，“工业化程度”不那么高的普及版室这片草地来吃草。他在那里打发时光，一边吸吮着烟斗，一边读着叶兹和格拉得·曼内·霍並金斯；或者用宽容的眼光浏览我的报告。有时，还默想着告老还乡，来到奥绒公园安度余年。我时常拿麦克哥罗——希尔开心，但是这些玩笑就象我报告中的口气一样，不但一点也没有得罪他，反而使他颇觉开心。长期以来，弗莱尔已成为公司沉闷气氛的牺牲品。这个巨大的蜂房使它的雇员变成麻木不仁的机器，甚至最有抱负的人也不例外；因此，既然遇上好作品的机会不到万分之一，那么从中寻找点乐趣又有何不可呢。其中有一篇，我尤为喜欢。主要因为它是我仅有的，稍稍含有感情色彩的报告。

《哈罗德·哈发格家族史诗》，作者冈达·弗尔金。诗歌。

冈达·弗尔金并非假名，而是作者的真实姓名。许多拙劣的作者，他们的名字听起来很奇怪，一看上去就象假的，而后来却发现是真名。这篇大作会怎样呢？《哈罗德·哈发格史诗》并不是从邮局不请自到，也不借助第三者之手，而是由作者本人亲自送交给我的。一星期以前，弗尔金带着一个手稿包和两口手提箱来到了会客室。梅耶小姐传报说他要见编辑。这伙计大约六十开外，中等身材，略为驼背但身体还算结实；风雕雨刻的脸上长着两丛灌木似的灰色眉毛，一张温和的嘴，和一双我从未见过的最苦命，最可怜的眼睛。穿一件毛领风衣，头上扣一顶农民黑皮帽，上面的护耳搭拉了下

来，盖住了耳朵。他有一双硕大无比的手，红红的指关节粗糙突出。他的鼻子有些漏。他说他想递交手稿。看起来相当疲劳。当我问到他从哪儿来，他说，他从北塔达科塔明一个叫龟湖的地方，乘汽车历时三天四夜，就在刚刚一小时前到达纽约。就是为了递交手稿吗？我问。回答说：是的。

然后他主动介绍说，麦克哥罗——希尔是他造访的第一家出版商。这使我相当意外，因为即使象弗尔金这样孤陋寡闻的人也很少首先选择这家公司。然而，当我问起是怎样作出这么奇特的抉择时，他说纯粹是出于偶然，他本来心中并没计划到这来。他告诉我说，在途中的明尼阿波利斯，汽车作了几小时的停留，他趁这个时间到电话公司借了一本纽约市的电话簿。他不想做出偷撕书页这种粗鄙的事，于是他花了一个多小时把纽约市所有的出版商的名称和地址统统抄了下来，打算到纽约按名称字母顺序A、B、C、D，挨个找上门去。但当他在离此仅一街区之隔的波特汽车站下车后，一抬头，翠绿色的巨大石碑上，一幅招牌赫然映入眼帘：麦克哥罗——希尔。于是他就到了这儿。

这位老伙计看来已精疲力竭，脸上还露出惶惑的表情——他说自己从未到过明尼阿波利斯以东的地方——于是我觉得至少应当带他下楼到餐厅去喝杯咖啡。我们坐着喝咖啡，此时，他谈起了自己的身世。他父母亲是从挪威过来的移民，而自己整个一生都在龟湖镇附近种植小麦。二十年前，一家矿业公司在他的田土下发现了煤矿，于是与他签订了